

女性史研究的独特方法

——格尔达·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探析

韩 毅 金利杰

【提要】 格尔达·勒纳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也是美国黑人女性史研究的奠基人。她率先明确提出,女性史需要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努力为之构建社会性别的解释方法。她的解释方法可具体化为解构法、整体法和多维综合法。社会性别解释方法冲破了语言、观念对女性史研究的桎梏,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侧重研究其共性,也将女性作为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阐释女性间的差异性,并希冀从中探寻两性的普遍史。尽管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的前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仍是女性史解释的有效方法,并前瞻性地指明了女性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格尔达·勒纳 女性史 社会性别

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1920—2013)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也是美国黑人女性史研究的奠基人。勒纳著名的《父权制的缔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一书,被认为是可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相媲美的经典之作。她对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明确指出研究女性史需要独特的方法,并努力为之构建社会性别的解释方法。勒纳的研究成果在实证和理论两方面,都对美国女性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在概述勒纳学术研究经历的基础上,对其社会性别解释方法进行系统阐述,并借此探讨其贡献及局限性。

一、勒纳的生平与学术研究经历

勒纳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1939年她移民美国。后来,经过勤奋刻苦钻研,她成为了一名小有成绩的英语作家。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于对自身女性经验的思考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最终,勒纳走上了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

勒纳于1965年和1966年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执教于长岛大学布鲁克林分校,被聘为副教授。1966年,她担任美国一个女性组织的负责人。1969年,勒纳受美国历史学协会的委托,组建了“美国历史职业妇女合作委员会”并出任主席。三年后,她开始在萨拉劳伦斯学院建设女性史硕士点。勒纳从198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并逐渐推进女性史博士点建设。1981年至1982年间,她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首位女主席。1991年,她分别获得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和意大利的贝兰吉奥(Bellagio)研究基金,用以发展女性史研究。在2013年1月2日勒纳离世前的半个世纪里,她一直活跃在欧美大学的女性史讲台上。她在美国女性史研究和女性史人才培养方面都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勒纳的女性史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勒纳女性史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史并不是独立的史学分支。勒纳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习历史以来,接受的都是传统史学的训练。所以在最初的女性史研究中,勒纳采用的是“女性的价值”或“填补的历史”的研究框架,按照男性的话语体系建构女性的历史。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来自南卡莱罗纳的格里姆克姐妹》(*The Grimké Sisters from South Carolina*)成为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1967年,该文出版,引起了部分研究者对美国早期历史中女性的关注。由此,她开辟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女性历史研究领域。^①20世纪70年代初,勒纳搜集、整理、编辑了一些女性遗留下来的书信、日记、文章等,并据此探究了女性的历史贡献及女性受压迫的动态过程。此时的女性史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与系统。1971年,勒纳出版了《美国历史中的女性》(*The Woman in American History*)。第二年,她又出版了《黑人女性在白人美国》(*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至此,勒纳的女性主义历史写作意识已悄然发生了质变,从最初探索精英女性的物质与精神贡献,逐渐延伸到记述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历史。她开拓了美国黑人女性史的研究,是美国最早探索非裔女性历史的学者之一。^②

勒纳女性史研究的转折期。经过不懈的努力,“短短五年,女性史学家已经将女性史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领域。”^③1977年,勒纳出版了《女性的经验:一部美国纪录片》(*The Female Experience: An American Documentary*)一书。她已不再单纯地叙述与记录女性的历史,而是在对女性资料进行整理与编辑的同时,对每一部分内容又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解释。《人类多数寻找其历史》(*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明确地挑战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内容与认识标准,进一步批判了传统史学在女性历史研究中的不足。此时,勒纳已经逐渐从微观实证研究向历史理论研究过渡,寻求解释女性历史的自定义方式。

勒纳女性史研究的成熟期。1975年,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最先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此后,“社会性别”研究广泛兴起。勒纳在鲁宾的基础上补充说,社会性别一词使我们警觉到一种被给予的、与实际不同的、在生理性别之上有意识构建精神层面的意义。^④《父权制的缔造》与《女性主义意识的缔造》(*Cre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是勒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史上的经典。在《父权制的缔造》一书中,勒纳强有力地阐述了父权制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基础上的,并在这种压迫的经验上,广泛建立起了人类的各种等级制度。她在《历史为何重要》(*Why History Matters*)和《接受历史》(*Living with History*)中展现了她的“普遍史”观念。她不但对女性的历史进行解释,还关注到了被史学忽视的部分男性群体。由此可见,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的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女性,而是将传统史学的弱势群体囊括到“普遍史”之中,具有强烈的综合性。这正是勒纳社会性别历史研究有别于他人之处。此时,她的女性史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理论探索,她呼吁历史学家写作完整的人类史,^⑤试图将女性史研究引入真正的、普遍的人类历史之中。

① Peter G. Filene, "Integrating Women's History and Regular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13, No. 4 (Aug. 1980), p. 485.

② Nan Elizabeth Woodruff, "Review of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46, No. 3 (Aug. 1980), p. 454.

③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5. 此五年指的是1969—1974年。

④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49.

⑤ Rose Natalie, *An Essential Indispensable Heritage: The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omen's History Program, 1972 - 1979* (AAT 1419811), Sarah Lawrence College, p. 76.

勒纳对史学理论特别是女性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她率先明确提出,女性史需要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努力为之构建社会性别的解释方法。很久以来,女性史研究一直没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方法。针对这一问题,早在1969年,勒纳就发表了《研究美国女性史的新方法》一文,对当时女性史研究仅记述而无解释的状态进行了批判^①,并提出了女性历史研究新的解释方法。虽然她当时并没有使用社会性别概念,但其中已经暗含了部分社会性别的解释方法。1986年10月,勒纳在《父权制的缔造》中指出:女性既是一种生理性别(Sex),也是一种社会性别(Gender)。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是在涉及财产、资源及特权的分配等事务中,依据文化限定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两性区别对待的制度化。^②勒纳已经明确意识到需要通过文化和制度对女性史进行解释。自“社会性别”诞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寻求社会性别的历史解释方法,却没有形成专门的成果。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也只是散见于她的著作之中,可分为三个方面:社会性别解构法、社会性别整体法和社会性别综合法。下文分别予以阐述。

二、社会性别解构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福柯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和历史及历史解释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③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勒纳在女性史研究领域率先提出,“女性被历史遗忘,并非是男性历史学家的罪恶阴谋,而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术语。”^④在历史上,女性有不同的称呼,如woman(女性)和lady(贵妇)等。究竟女性是woman还是lady,在父权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是由女性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决定的,而与女性自身的贡献无关。^⑤显然,语言成为一种权力手段。女性群体被割裂,这导致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这制约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整体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建立统一联盟的可能性。因此,勒纳认为在女性史的研究中必须废除语言的性别特权。

然而,语言具有稳定性,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勒纳仍希望解构以男性为历史研究中心的内在假设。她通过比较的方式对人们熟悉的词语进行分析,其中以对女性历史地位的词语分析最具代表性,如“对女性的压迫”(Oppression of women)、“女性从属者”(Subordination of women)和“剥夺”(Deprivation)。

“对女性的压迫”经常被女性作家、思想家和女性主义者使用。“受压迫”一词暗示受害。使用这一词语的研究者通常是将女性定义为一个受害群体。“受压迫”聚焦于虐待,表明他(她)们已经被虐待。这个词暗示着权力斗争。女性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女性受到的压迫,也包括女性对他人的压迫。因此用“受压迫”描述女性群体经验时,许多内容被忽视了。^⑥显然,勒纳意识到“受压迫”一词无法真实表达女性群体的真实地位。

① Gerda Lerner,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 No. 1 (Autumn, 1969), p. 53.

②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38.

③ 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第18页。

④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p. 140.

⑤ Gerda Lerner, *The Female Experience: An American Documentary*,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 1977, pp. xxviii - xxix.

⑥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p. 233 - 234.

勒纳主张 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用“女性的从属”表达出来。“从属”允许统治者与从属者联合,从属者自愿接受从属地位以获得相应的权利。从属包含了“家长统治”及其他关系,比“受压迫”更具客观性。然而,对于女性是“受压迫者”还是“从属者”,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朱迪思·班尼特(J. M. Bennett)就明确表示支持女性是“受害者”的观念。她认为“从属者”的身份不能令女性积极参与到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斗争中。^①显然,班尼特的这一论断更多是为女性权利运动服务,而勒纳则是从历史研究的视角进行分析的。

勒纳解释“剥夺”一词时说“剥夺”也有隐藏和掩饰现有权力关系的作用。“剥夺”表示大权和特权等的消失。“剥夺”主要用于那些已经失去权力的人,而不是正在失去权力的人。“剥夺”的施动者非常广泛,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②

通过对勒纳著作的研究,可以看出她确实偏爱使用“从属者”这一词语。然而,她并没有否定其他词语,她明确指出,“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从属者”及“剥夺”等词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女性。尽管女性群体是相对独立的性别体系,但其内部的多样性让研究者无法用统一的词语对其进行描述。女性的特殊性必然需要研究者使用不同的适当术语进行解释分析^③。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社会标准并非真理,而是人为的文化偏见。^④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史研究的主流仍处于传统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女性史学理论的先锋,早在1986年勒纳就对“父权制”、“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概念进行了社会性别解构,批判了本质主义者提出的两性差异由生理差异导致的观念。

在《父权制的缔造》中,勒纳梳理了女性成为男性从属者的人为化和制度化的历史过程。自原始社会起,人类就开始了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分工。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是与母性职责相一致的劳动,女性逐渐在经济上从属于男性。法典明显赋予男性与女性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与保护权益。宗教中,男神与女神、男祭司与女祭司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逐渐从两性平等转向了后者对前者的从属。在研究中,勒纳对女性的劣势身份进行语言和观念的解构,阐述了几千年来女性对男性的从属是人为形成的过程。正如斯科特曾指明的:如果不解构绝对的社会性别差异的分类,我们就无法变革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标准、原则及权力关系。就女性史研究而言,解构确实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⑤勒纳的社会性别解构法就是对已有的、不能切实反映历史中两性之间及性别内部关系的语言和观念的解构,倡导写作客观的女性史。

三、社会性别整体法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史已有大量著作出版,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集中关注女性中杰出、优秀的那部分,二是偏重于关注女性权利运动。^⑥两者所研究的对象都仅仅是最为优秀的

① J. M. Bennett *History Matters: Patriarchy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 21.

②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 235.

③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p. 235 - 236.

④ 刘军《论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5页。

⑤ Karen Offen, *Writing Women'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1, pp. 66 - 68.

⑥ Nancy A. Hewitt, "Beyond the Search for Sisterhood: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in the 1980s", *Social History*, Vol. 10, No. 3, North American Issue (Oct., 1985), p. 299.

女性,这仍旧属于精英史学的研究范畴。勒纳指出,上述研究思维有碍于思考女性全面的历史,虽然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对女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不应成为女性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她认为,鉴于女性有“从属者”的共同社会性别经验,女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解释。为了使女性成为历史解释的中心,研究者必须关注有别于男性活动、经验和思想的女性历史,从而切实提高女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①除此之外,将女性整体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既能够挖掘出更多被隐藏的历史,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理解社会历史的新方法。^②勒纳将女性置于历史研究中心的社会性别整体解释方法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勒纳将无薪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劳动进行解释。文化和制度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各自的劳动范畴、社会意识、人生的契机等。事实表明,文明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贡献范畴存在很大差异。根本差异是绝大部分女性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及照料孩子,而绝大部分男性则不会参与其中。众所周知,照料孩子是具有社会和经济职能的劳动,舍弃它社会将无法存续。

这一方法在《父权制的缔造》中有所体现。以人类之初女性哺育子女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开端,勒纳阐明了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曾起到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实践和教化中,女性逐渐形成了友爱、无私、善良、忠诚等优秀的品质,而这些优秀的品质又进一步促进了女性照料他人的文化的形成。最终,照料弱者成为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普遍职责。在人类初期,女性是火种的重要保卫者、保存食物的劳动者、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女性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烹饪技能;女性发现了一些植物可以作为药材、燃料、麻纱和布料的秘密等。因此,尽管女性的发现与发明有别于男性所发明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但两性对社会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具有同质性。因而,即使女性的知识没有比男性更伟大,也至少同样伟大。

其次,勒纳倡导将公益事业等内容作为女性对社会的重要贡献进行解释。在研究中,勒纳记录了女性诸多相关的历史贡献,拓展了女性贡献的范畴。以美国为例,她阐述了女性除从事家务劳动、照料家人和从事有新工作外,也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之中。如女性曾经首先发觉一些社会需要,建立了孤儿院、敬老院、幼稚园、社区图书馆和基础教育机构等。这些工作为家庭减轻了一定的负担,且帮助部分女性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时间,以便从事有新工作。女性还通过请愿、游行等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所需要的费用都是她们通过志愿活动筹集的。女性对社会文化和群众关系网络的构建,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对社会基层文化的发展都有贡献。勒纳还记录了在南北战争期间众多女性接受了护士培训、战后她们成立美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女性根据其在慈善、福利和教育机构的经验,逐步促进医院发展的历史;在新教改革中的欧洲女性以及西进运动中的美国女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社会作用的历史等。此外,在战争期间,女性是有力的支援群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女性随军服务,是其为国家、所在阶级和种族服务的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女性较少出现在战争前线,但她们以生产军用物资等方式成为战争机器的一环,付出了与男性同样巨大的代价。

最后,勒纳指出,应将女性与被历史研究忽视的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因为文化和制度给予了这些不同群体以相似的历史经验。勒纳建议女性史研究应该强调将女性作为整体的解释方法,同时注重研究曾经被忽视的历史领域。她表示,对于女性这个历史群体,不但要理解其特殊性,

^① Gerda Lerner, "U. S. Women's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 16, No. 4 (Winter 2004) pp. 10 - 27.

^②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p. 142.

而且还要掌握其与其他群体、相对群体的共性。^①在《历史为何重要》和《女性的经验》中,勒纳将女性与黑人男性在经济方面的历史进行比较,阐明两者具有相似的被剥削的历史经验;将女性与少数族裔在教育方面的经验进行比较,论述两者有共同的被歧视的历史经验。

此外,社会性别整体解释方法也适用于女性大整体下各个层面的女性小整体的研究。勒纳以南北战争前白人女性、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比较研究为例,阐述了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共性与种族、阶级差异。共性在于她们都受到性别压迫;差异性在于白人女性更多地受到白人内部的阶级压迫,黑人女性更多地受到种族压迫。与此同时,尽管底层白人女性的境遇很差,但是她们仍然要比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更有优势。在近现代美国社会的就业方面,由于对黑人男性的种族歧视要重于黑人女性,而白人女性又受到习俗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因此黑人女性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有偿劳动机会;而在不同人群的工资水平方面,1950—1987年美国工人工资的比较表明:白人男性赚最高的工资,随后是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女性。通过对黑人男性、女性和底层白人男性的研究,勒纳有力地证明了女性在经济中的共性和不同群体女性的差异性。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在宏观方面掌握女性群体的共性,找到共同研究的基础;也可以在微观方面发现不同女性群体的差别,找到女性内部各群体的特殊性。这种方法有利于从宏观到微观对女性整体的历史进行客观、真实的认识。

四、社会性别综合法

波伏娃是西方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研究的先驱者。她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至今仍是探讨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她的女性是男性的“他者”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史研究者,但女性的“他者”地位长期以来也有碍于女性对自身真实历史身份的多维理解。因而,勒纳较早地意识到“女性”这个主题涉及广泛,无法用一种单独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与分析,所有范式都是有局限性的。^②因此,她试图对女性进行整体解释的同时,也意识到女性分布于各个民族、种族、阶级和阶层之中,她们无法被真正联合起来、很难成为一个牢固的团体,故而需要对其内部的差异进行系统考察。这种方法是在“社会性别”维度基础上,将宗教、阶级和种族等观念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综合的解释模式,以求还原和阐述女性的历史。^③

勒纳批判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进行解释时,没有关注到性别、种族和民族的差异;结构功能主义者没有关注到阶级和性别的差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没有关注到思想、价值和心理等因素的作用;社会史学家则将全部女性都视作无名和受压迫的。在批判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勒纳将女性史解释的主题分为“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三个部分。然而,她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三个主题,而是将三者有机结合进行综合的阐释。

勒纳挑战了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概念。马克思的“阶级”是指在生产中起到同等作用的群体。韦伯则界定“阶级”为人的共同机会,如其有权决定利益的分配等。勒纳在批判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不能将女性简单地置于与男性同等的阶级分类之中,“视女性和男性属于同一个阶级的研究

^①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p. 191 - 192.

^②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pp. 6, 125.

^③ Rose Natalie, *An Essential Indispensable Heritage: The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omen's History Program*, p. 7.

者,没有限定性别差异。‘阶级’是有性别差异的。‘阶级’描述了男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男性对妻儿和资源的权力。‘阶级’将女性描述为生产工具,她们是为男性服务的。”^①所以,女性工人都表示其所受更多地是阶级而非性别压迫。而黑人女性工人则认为她们所受到的种族压迫要多于其作为工人所受的压迫。^②

在此,勒纳既探究了“阶级”概念下性别的差异,即男性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又分析了种族间女性受压迫程度的明显不同。因此,我们断定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姐妹”,女性无法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体。我们也观察到如果不能用差异的视角重新解读“阶级”,就无法对女性进行彻底的“阶级”解释。

一方面,女性无法像某些受压迫群体一样,从某个阶级、民族、种族的历史之中彻底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女性所受到的阶级、种族、民族压迫的经验也有别于相同群体中的男性。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将“种族”视为一个大的人类家庭,拥有共同的语言和血缘、相同的传统和动力、同一的历史,同种族的人追求着某种一致的成就、孕育着同样的生活理想。对此,勒纳明确指出,必须重新定义“种族”。“种族”是差异的标志之一。受压迫种族的两性受压迫的程度存在差异,而同一种族内不同的女性受到的压迫程度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故对不同女性历史的解释不能趋同。

勒纳在《历史为何重要》、《黑人女性在白人美国》和《女性的经验》中,都有对黑人女性作为女性受到的性别压迫和作为黑人受到的种族压迫的实证研究,阐明她们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受到的压迫并不完全相同。此外,勒纳还在《历史为何重要》中记述了殖民地女性所受到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剥削,这种压迫与殖民地男性所受到的剥削在意义上也非完全相同的。因此,她认为如果我们将“阶级”、“种族”、“性别”等视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我们就不能真正解释女性的历史。三者等级制体系中是互相交织、互相解释、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

勒纳的社会性别综合解释方法,并非要凸显性别,而是以性别为根基,探究阶级、种族与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女性历史。她指出:(对女性来说)统治集团的女性拥有伦理特权,白人女性拥有种族特权,精英女性拥有阶级特权,这一切使女性与等级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从根部切断了女性形成共同利益群体的能力。^③由此,勒纳认为在女性历史的解释模式中应考虑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密切结合与相互统一。^④

五、评价与反思

勒纳继承了美国女性史鼻祖玛丽·比尔德的遗志——“阐明女性的历史中心地位,将女性融合到历史研究的主流之中”^⑤。她是首位明确提出女性史需要自己特有研究方法,并从理论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性别批判的美国女性史学家。勒纳在研究中所呈现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的贡献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男性史学和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有力挑战。勒纳致力于为女性史研究寻求更客观的解释方法:确立女性经验特征的标准,将女性史研究的客体从精英女性延伸到普通女性;结合女性整体的

①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36.

②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p. 81.

③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97.

④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53.

⑤ Mary Beard, Lane Ann, *Making Women's History: the Essential Mary Ritter Beard*, Feminist Press 2000 p. 3.

从属经验与女性间差异经验对女性历史进行阐释。勒纳借此挑战了男性史学,对女性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之一的地位进行专门研究。此外,她也挑战了将两性视为对立关系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两性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彻底将女性作为独立的整体,建立两性完全隔离的历史,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勒纳将女性视为促进历史发展的主体之一,认为女性史研究需要一种多层次的解释方法,以便寻求真正客观的女性史。

第二,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勒纳期望用性别中立的语言记录与解释女性真实的历史,阐述与分析女性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考察女性经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虽然勒纳将语言和观念的解构方法用于社会性别解释中,但她面对20世纪90年代后众多女性史研究者倒向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局面,明确指出反对简单粗暴的划分,批判孤立和静止的分析方式,认为“目前的解释方法和概念仍完全处于一种静止的辩证框架之中”。^①她进而指出: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性别二元系统外的多种因素被忽视。例如,如果美国黑人女性有独特的“立场”,其他种族和不同宗教的女性则都有。这种多样性是无限的。当人们考虑到每一种“立场”时,事情则被无意义的观点相对化了。它是不可被接受的,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②勒纳为女性史研究中信奉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想的研究者敲响了警钟。她认为,用词语构建女性的历史地位时,必须提防语言留下的陷阱;解构观念时,要防范它只破坏不构建的劣势。

第三,指明了构建普遍人类历史的性别导向研究方向。人类是由两性构成的,研究者应当平等地对待两性的历史,并以最佳的方法对两性的历史进行阐释。显然,勒纳的历史解释方法目前“是以女性整体为中心的”,她希望先借此缩小女性历史研究与男性历史研究的差距。勒纳确信一旦消除了男性偏见,研究者会把“性别中立”的解释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之中。^③勒纳还进一步“提出了性别导向的历史进程的新解释”,^④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解释。女性历史不应被孤立地解释,而是应同男性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但不应机械地将女性塞入男性声称的人类历史之中。她希望女性史研究关注两性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为构建普遍的人类历史指明了方向。

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有学者认为它并没有对两性地位的变化做出深层次的解释,^⑤还有学者批判勒纳不重视人的因素而是过分强调社会限制。^⑥综合以上研究及学者们对勒纳解释方法的质疑,笔者认为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的前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将女性置于历史之中的一个前提是女性对社会经济、公共事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正面”贡献。然而,如果仅从这些“正面”贡献的视角研究,一些女性将会被置于历史研究的边缘。例如,那些天生因疾病缠身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甚至需要别人为其服务才能继续存活的女性,以及那些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就走上犯罪道路的女性,将无法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然而,身患疾病的女性对医学具有相应的研究价值,而女性犯罪者也对社会学、侦查学、心理学等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而,研究者不应该仅仅从女性对社会、历史的“正面”作用进行女性史的思考。在研究

①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7.

②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91.

③ Gerda Lerner, *Why History Matters: Life and Thought* p. 143.

④ Deborah Gewertz, “Review of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5, No. 3 (Aug., 1988) p. 596.

⑤ Elizabeth Fox-Genovese, “Review of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55, No. 3 (Autumn, 1987) p. 610.

⑥ Bonnie Smith, *Women'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12.

女性的历史时应更彻底、更全面地将女性作为“人”来看待,不应附加其他条件。勒纳寻求女性对历史的贡献,以此作为社会性别历史解释方法的前提,陷入了史学研究的“贡献”标准或“功利”标准之中。

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的另一个前提是她弱化了生理性别对女性的作用。勒纳将女性的母亲职责分为两个部分:生育子女的生理功能和养育子女的社会功能。勒纳指出,生育子女是女性的天职,而女性养育子女的社会功能是人为形成的。勒纳进而提出,生理因素并没有将女性置于社会劳动的边缘,而女性被赋予照料孩子的责任的文化迫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这限制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和范围。^①勒纳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女性生育子女后对孩子的哺养也是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决定的,不能完全归因于社会性别因素。勒纳也表示在早期的劳动分工中,由于女性选择的工作通常与其养育孩子的活动相适应,所以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了这种分工。^②由此可见,勒纳也承认女性对社会性别关系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并非完全是由社会决定的。正如恩格斯说的,进入文明社会后,女性的家务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女性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③显然,在文明社会,性别分工的确导致了女性处于劣势地位,而这种劣势地位是由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对解释女性史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女性历史解释缺少了生理性别因素,显然是不完整的。

尽管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理论成果在当时的先进性以及对其后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1998年,琼·斯科特将女性史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第三种则是在女性史研究中发现女性专有的理论,重新写作历史。^④而20余年前,勒纳在《置女性于历史之中:定义与挑战》一文中对女性史学分期第三、第四部分的论述与之如出一辙。她的前瞻性又如学者所言:女性史学家们已超乎预料地成功完成了勒纳设想的一半,她们挖掘出众多的新资料、建构了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了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目前,研究者所阐述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社会性别的主题。^⑤事实上,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已经超越了女性研究范畴,已经将性别、种族和阶级有机结合在一起,旨在构建真正普遍的人类史。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为女性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韩毅,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10136;

作者金利杰,沈阳师范大学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讲师;邮编:110016)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黄艳红)

①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 42.

②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 42.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④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⑤ Mark Christopher Carnes, *Meanings for Manhoo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 1.

discussing how they foregrou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agency in histor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ll these efforts helped la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memory study and that memory study has methodological, historiograph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cal study. Memory study deploys a new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temporality,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ist assump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past as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Yet incorporating memory and trauma into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lso means to acknowledge and accept differing status of analytically recuperated “facts” and victim testimony in historiography. In the end, the author concludes, it remains to be seen or to be debated whether and how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history, memory and ethics can help constitute a viable and coherent mode of historiography.

From Quantitative Historiography to A New Historiography of 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Reflections on the New Tendency of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West// Han Jiong

Since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main question confronting today’s historians is whether historical writing can transcend “the trap of definit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and become a historical science, using 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has helped historians to locate hard proof, making historical study more a science. Examples of which are the practices of *histoire serielle* and Cliometrics (the new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Meanwhile, there is also the need to combin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is combination would lead to a new historiography of 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How quantitative research helps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of historical study; 2)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method in Eu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3) Reflec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 in historical writing as seen today. He concludes that if used properly,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using 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an revolutionize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near future.

A Study of the Compilers of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Jiang Qizhou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VCH) has been the most well-known local history series in England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Its compilation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English historiography.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English historiography was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Local history writing, such as the VCH, had begun being compiled by amateur historians, who by modern standard, did not possess the full sense of academic autonomy, or professionalism. Afte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made more strides, the compilation of VCH also moved to University of London from the 1930s; amateur historians’ work became sneered upon by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 years a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completed, local history compilation became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historiography. It wa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who completed the compilation of VCH in the end.

A Unique Approach to Women’s History: A Study of Gerda Lerner’s Analysis of Gender// Han Yi, Jin Lijie

Gerda Lerner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US women’s history as well as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s

history. She is also the first historian who argues that women's history needs its own methods and tries to introduce gender as a category to interpret history. Her analysis of gender is deconstructive, holistic as well as multi-dimensional. The use of gender is of help to break out of the linguistic and conceptual constraints on women's history. It helps historians to see women as an independent entity with shared commonality. Meanwhile, it also draws attention to diverse experiences of women by placing them in social and gender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history. The premise of Lerner's analysis of gender seems to have some inherent problems. But her approach remains quite effective in studying women's history; to some extent, it also points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field.

The Study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Changing Trend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Past 150 Years//Xu Liang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ivil War has caused many controversies almost ever since its outbreak.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hanges and historical thoughts of different period, American historian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precipitated and engaged in many fierce and prolonged debates on the causes, natur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ivil War.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ivil War, therefore, has reflected t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schools, such the Progressive School, the Revisionist School, the New Nationalist School, the New Revisionist School and the Pluralistic Social School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s such, it also helps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ideas and trends of the works of American historians from the mid 19th century to this day.

Historical Source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Beyond the Predicament in Studying Jiangnan's Urb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Jiang Weitao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Jiangnan (Yangzi Delta), the study of its urbanization, involving cities, town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has yielded fruitful outcome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d by Gilbert Rozman and G. William Skinner, some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through certain case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Ye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n defining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Jiangnan with valid sources. Some studies also show the tendency of overgeneralization. Consequently, it remains unclear abou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Jiangnan and Jiangnan's overall urbanization level.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two ways. One is to shift research focus by expanding the study from late imperial to modern period; the latter can extend from the 19th century all the way to the mid 20th century. The other is to adopt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by borrowing new methods from social sciences so that scholars can develop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urces. He also believes that it might be useful to create two contrasting exampl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periods for comparison in order to cast in relief the actual level of Jiangnan's urba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